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编

文化决策参考 (2014)

The Referenc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s Decision
Making (201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文化决策参考

(2014)

The Referenc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s Decision
Making (2014)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决策参考. 2014/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 - 7 - 5097 - 8741 - 0

I. ①文… II. ①首… III. ①文化事业 - 发展 - 研究

- 北京市 - 2014 IV. ①G12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5788 号

文化决策参考(2014)

编 者 /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吴 超

责任编辑 / 刘 翠 宋淑洁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8741 - 0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于2012年2月建院，其自我定位是兼具学术型思想库与研究型智库双重身份的高端科研机构，其办院宗旨是“学术本位，公共关怀，首都意识，全球视野”。

文化研究院的内部刊物《文化决策参考》作为研究院的主要机关刊物，其编辑方针充分反映了研究院的自我定位和办院宗旨。刊物从文化研究院建院伊始即开始编辑出版，到现在已经出版36期。该刊以专题研究论文或调研报告的形式，从顶层设计的高度研究国家和北京文化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议题，为市委、市政府的文化决策提供学术支持。刊物直接上报市委、市政府和其他管理部门，有效实现了学术成果向政策建言的转化。

2014年度的《文化决策参考》秉持文化研究院的一贯宗旨，其选题与研究方法力求前沿性、实证性和前瞻性，密切关注中央和北京市的文化政策导向，关注当下文化态势，通过第一手资料和扎实的个案分析，积极回应国家与北京文化发展的最新动态，为政府的文化政策提供智力支持。文章的具体内容涉及当下文化建设的各个重要方面，比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价值观建构、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体制改革、公共文化服务等。

为了让《文化决策参考》上发表的文章被更多的读者看到，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影响力与决策影响力，我们按照惯例以图书形式编

辑出版《文化决策参考 (2014)》，期待得到各级领导、同行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回应和批评。同时，我们也诚挚希望大家继续关心《文化决策参考》今后的编辑出版，踊跃投稿，为繁荣首都文化事业共同努力。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2015 年 10 月 12 日

目 录

当今中国为什么盛行比坏哲学	陶东风 / 1
探索新的评价体系 促进经济发展转型	宗 舒 / 7
以“和谐指数”超越经济至上主义	贝淡宁 莫映川 / 13
我国文化产业健康发展需要完成七个转变	祁述裕 孙 博 / 33
国家文化中心建设亟待升格战略定位和主体功能	何 奎 / 48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文化治理现代化	范玉刚 / 53
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双轮驱动”战略	杜 蕊 / 62
媒介生态学视角下的文艺生产与传播 ——以 2014 年“北京春晚”、《中国梦 365 个故事》为例	郑以然 / 69
“全球在地化”时代电视艺术的建构与传播 ——以 2014 年“北京春晚”为例	盖 琪 / 75
政府搭桥 市场择优 ——“北京首届剧本及曲艺作品推介会”机制创新经验谈	蒋 璐 / 83
关于构建公民文化权利体系的设想	魏 宏 戴建华 / 88
文化发展繁荣的新坐标和新任务	高书生 / 92
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是激发社会与市场的 活力	陶东风 / 96
引入多元主体参与文化治理	蒋 璐 / 100

舆情监测应结合事前预防与事后处置	彭宗超 曹 峰 / 105
舆情监测应兼顾大数据监测与抽样调查	金兼斌 / 113
重大项目舆论风险评估的重要性	段赛民 / 121
帮助解决当代问题应成为儒学复兴的追求	汤一介 / 126
国学复兴应着力于教育与新文化体系建构	陈 来 / 133
现代新儒家不能建构中国道路	王 悦 / 141
建设全国各民族融合的文化象征与交流平台	张永江 / 146
开源开放可成为北京引领文化创新的立足点 ...	倪光南 王东宾 / 153
注重基层历史文化区保护和考古勘探程序前置	唐晓峰 / 161
爱城主义与身份认同	贝淡宁 艾维纳·德夏里特 / 169
以“双核多中心”重构北京城市空间	吕拉昌 黄 茹 胡海鹏 / 178
重构北京都市区多中心体系	于涛方 / 185
北京经济中心功能的疏解	马秀莲 / 192
以曹雪芹诞辰纪念为契机加大保护曹氏遗迹的力度	王 彬 / 197
城市规划项目审批中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	岳升阳 / 206
传播治理的关键是基层组织传播	王维佳 / 214
用户互动和公共投入促进媒体融合	严 禹 / 222
微信等网络新应用的安全影响及治理对策	刘瑞生 / 230
美国媒体转型过程中的政府参与	郑以然 / 238

当今中国为什么盛行比坏哲学

陶东风*

如果搞一个民意调查，问一下国人“你对当下中国的道德状况是否满意？”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回答“不满意”“很不满意”甚至“极不满意”。这当然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可以说犬儒主义盛行、投机行为泛滥、人际关系恶化、社会诚信缺失，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处在道德底线之下的恶行，总是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的话：“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

说得严重一点，我们的文化与道德正在呈现坏死之征兆。

更可怕的是：很多人其实已经看到社会风气问题、道德问题的严重性，看到了犬儒主义的盛行、投机行为的泛滥、人际关系的恶化、社会诚信的缺失。但奇怪的是：眼看着自己生存的公共世界正在一天天坏死，他们不是努力去疗救它、修复它，或者至少自己坚持不作恶，而是出于为自己牟私利的目的，积极地甚至迫不及待地参与到对它的进一步败坏中，生怕晚一步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这种投机、犬儒、得过且过的态度，可能比世界的坏死更加可怕。因为这种人作恶的原因不是不能明辨是非，而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为恶却依然如此。崔永元在微博上曾经这样写道：“我们恨贪官，又拼命报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又削

*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首席专家。

(尖)脑袋往高薪单位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关系。总之,我们愤怒,不是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

这就是我们分裂的、犬儒式的生命哲学。下面让我来举一些例子。

最近两三年大学校园流行一种所谓“反反抄袭软件”,是专门为了对付现在大学使用的反抄袭软件设计的。为了打击论文抄袭,全国各高校在两三年前开始全面实施一种叫作“机审”的论文质量检测系统,也就是用一个专门软件来审查大学生、研究生的论文是否存在抄袭问题。该软件的正式名称为“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它通过数据库对比,来判定一篇论文是否有抄袭行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学校用反抄袭软件来检测学生论文是否抄袭,商家则推出了“反反抄袭软件”来应对。这个软件是专门用来对付论文“机审”的,其数据库比“反抄袭软件”更加全面,操作更加简易,短短十分钟,便能检测出一篇论文同数据库雷同的部分,用红字标出,并且给出修改建议。此外,商家还为付费者提供修改论文的注意事项和修改办法,也就是让一篇本来是抄袭的论文看起来不像是抄袭的,并且能够通过审查(比如把文字改为图表,改动语法、句式等)。该服务价格便宜,学生只要花一两百元,就能通过该软件逃过论文检测系统顺利过关。据报道,仅淘宝网上提供此项服务的商家就有1600多个。真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相信任何一个大学生、研究生都不可能没有基本的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抄袭是不应该的,甚至是不诚实的、可耻的行为,他们也不是没有被告知论文应该遵守的学术规范。但他们仍然选择了抄袭,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没有判断是非对错的能力,但是仍然选择了作恶。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悲剧:不是因为缺乏分辨是非、对错、好坏的能力而为非、犯错、作恶,而是在分明具备这种能力的情况下仍然自觉地、有意识地、“理性地”选择了作恶和犯错,明知其错而犯之,明知其恶而作之,明知其非而为之。

这种犬儒主义和投机活动的大面积泛滥,是对道德的巨大腐蚀。

近几年流行的官场小说、宫斗剧是这种社会风气投射到文艺创作中的结果。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权谋，是如何学会作恶。谁的权术高明谁就能在社会或职场的残酷“竞争”中胜出；好人斗不过坏人，好人只有变坏，变得和坏人一样坏，甚至更坏，才能战胜坏人。于是我们这个时代开始流行一种哲学：比坏哲学；一种心理：比坏心理。

电视剧《甄嬛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甄嬛刚刚入宫时还是一个心地善良、简单纯朴的女孩，没有心机，不会权谋，更没有害人的技巧。但在残酷的宫廷环境中，甄嬛时刻受到以皇后为首的宫廷势力的暗算和迫害。在经历了一系列惨痛教训之后，她终于懂得了一个“真理”：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你必须学会比对手更加阴险毒辣，你的权术和阴谋必须高于对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说，你必须比对手更坏才能战胜对手。最后，甄嬛终于成熟了，并通过这种比坏的方式成功地加害于皇后并取而代之。这就是《甄嬛传》传播和宣扬的价值观。

对比同样表现宫廷斗争主题的韩剧《大长今》，可以看出两者价值观的差异：长今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同样受到以崔尚宫为代表的恶势力的迫害，受尽折磨，但她没有像甄嬛那样“成熟”起来，没有通过比坏的方式战胜崔尚宫，而是始终坚持自己的道德立场和做人原则。这一作品的主题就是：只有坚持正义、不学坏才能最终战胜邪恶。也许有人会说，《甄嬛传》比《大长今》更真实，因为生活就是这样残酷，只有学坏才能生存。这种观点非常流行。我的文章《比坏心理腐蚀社会道德》在《人民日报》发表后^①，引起了巨大的争论，未来网做了一个调查，53.9%支持，40.5%反对（见图1）。^②我博客中这篇文章也留下了大量评论，反对的人不少，理由就是我的这种看法不切实际，唱高调。但我仍然坚持认为：即使现实生活中的确流行这种比坏哲学，文艺作品也不能复制它，宣扬它。文艺作品应该高于生活，超越现实，而不只是简单地复制现实，它对于生活的超越性就表现在超越而不是复制现实生活中的不健康的价值观，哪怕这种价值观非常流行，占据支配地

① 陶东风：《比坏心理腐蚀社会道德》，《人民日报》2013年9月19日。

② http://ygmp.k618.cn/news/all/201309/t20130921_3909751.htm。

位。在评价历史题材作品时,我认为最重要的标准不应是僵化的真实性标准(很多关于历史剧的讨论常常纠缠于真实性问题),而应是价值观标准。不正确的价值观会导致观众把不正确的生存理念带入现实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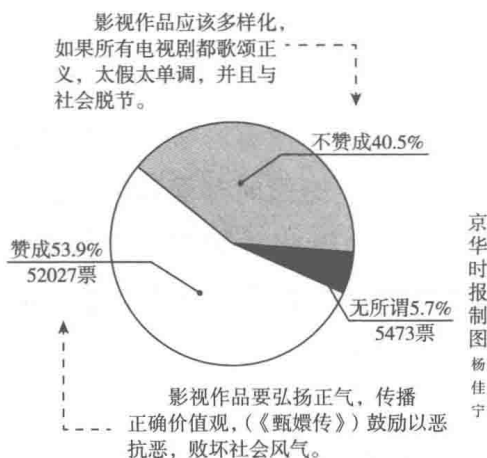


图 1

稍微了解一点西方大众文化的人都知道,拒绝学坏也是西方大众文化作品的一贯主题,从《灰姑娘》《白雪公主》等经典童话作品到《哈利·波特》等好莱坞大片,哪怕吃亏也要拒绝学坏是它们共同的主题。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处在险恶的环境中并受到坏人的算计迫害,但是他们从来不采取以恶抗恶的方式、通过比坏来战胜对方。我认为这点对于价值观教育,特别是对孩子的价值观教育非常重要。曼德拉的伟大也在这里:他自己受到殖民政府的残酷迫害,坐了几十年的牢,但是出狱后却并不主张以恶抗恶,以暴力抵抗暴力,而是主张宽恕和和解。

回到《甄嬛传》。我相信,绝大多数观众不可能没有基本的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不可能不知道甄嬛用权谋与诬陷手段对付皇后是不对的,甚至是可耻的,但他们仍然选择了以甄嬛为榜样,选择了以恶抗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明知其恶而作之,明知其非而为之。这种犬儒主义和投机活动的大面积泛滥,将会对社会道德造成巨大腐蚀。

当然,我们对于比坏心理的分析还不能停留在这里,我们还要深入

反思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会流行比坏。我不相信性恶论。我相信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广泛存在鼓励比坏的土壤、鼓励作恶的环境，也就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如果遵纪守法，用自己的行动去实施合乎道德的行为，会发现自己和环境、周围的人群、体制格格不入，发现自己总是吃亏，总是被嘲笑被冷落，甚至发现自己简直活不下去；相反，做坏事、做不道德的事则风险很低，甚至根本没有风险。不仅学术论文的写作是这样，其他领域也无不如此。本人坐出租车的一个深切体会就是：谁违规谁走得快，谁不违规谁就得没完没了地等着，被一辆接一辆的车子从前面插进去。今天中国社会最可怕的不是人们缺乏分辨是非好坏的能力，而是生活环境让人们很难遵纪守法，很难不做错事，更不要说做好事了，这点想想《离开雷锋的日子》就知道。

比坏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流行起来的：大家不是比着看谁比谁更好，有没有比我更好的；而是比着看谁比谁更坏，有没有比我更坏的。网上很多匿名帖子为学生论文抄袭辩护，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难道只有学生在抄袭吗？教授论文不也有大量抄袭吗？为什么只拿学生说事？为人师表的老师还抄袭呢，学生怎么能不抄袭？再说了，我们这个社会各行各业不都在造假吗？食品、医疗器材，哪样不造假？为什么只苛求学术界？在整个社会缺失诚信的情况下，要求学生或学术界谨守诚信，“出淤泥而不染”显然不现实。论文“反反抄袭”的存在就是例证。

用社会环境的坏、别人的坏来为自己的坏辩护的最新例子，就是某著名歌手为儿子李某某辩护的逻辑：“（我的）儿子没错，错的是社会环境。”她把儿子的错（实际上是罪）归结于坏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不愿承认自己的孩子该承担责任，而且还拉出几个和李某某一样坏或更坏的法官比较：“上海的4个法官还是成年人，司法干部同志们，都在这样的环境里失足了，孩子们怎么经得起这样的诱惑？”她的逻辑固然站不住脚，但这种心理却是非常普遍的。

在这种比坏心理的基础上，人们不仅不会产生悔过、愧疚心理，相反还会产生冤屈和倒霉心理：与我一样坏或比我更坏的人不是大量存

在而且逍遥法外、春风得意吗？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为什么只惩罚我一个人？我冤不冤啊？我曾经写过一篇博文，讲赖昌星、赖昌图等罪犯在法庭上为什么总是显得理直气壮，比法官、检察官还神气，有些还面带微笑、神色自若（比如之前被审判的“表哥”）。我猜想原因之一是：他们根本不觉得自己有罪，或者说，即使有罪也不是最大的罪，比自己罪更大、更坏、更恶的大有人在。通过这样的比坏法，他们觉得自己冤，自己倒霉。

如果此种风气长此下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道德只会越来越坏。良知根本不可能在比坏的过程中生长出来，只能在比坏的过程中坏死。要改变抄袭的现象，当然必须首先树立起诚信观念，培育诚信文化；要改变甄嬛的负面榜样效应，只能是让好人在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地翻身。这句话谁都能说，但做起来难。因为诚信文化离开了维护诚信的制度就成为一句空话。最好的社会是大家都有诚信，自觉地不作假；差一点的社会是有人想作假，但有完善的制度制约着他，让他不敢作假。要树立诚信观念，首先要建立维护诚信的制度环境。

探索新的评价体系 促进经济发展转型

宗 舒*

唯 GDP 论的影响在中国已经逐渐消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淡化 GDP 考核体系，逐步摆脱长期存在的 GDP 与政绩挂钩的格局。2013 年 12 月 9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规定今后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各类考核考察，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中央有关部门不能单纯依此衡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发展成效，地方各级党委不能简单地依此评定下一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绩和考核等次，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这意味着 GDP 指标以往在地方党政考核中的显赫地位正式终结。

同时，考核指标在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导向作用和激励作用仍然非常重要。确立“新发展理念”，同样需要一个合适的评价体系来进一步使新的发展观念深入人心，让各地的发展竞赛有更清晰和明确的目标。旧的发展观有一套以 GDP 为中心的评价体系，虽然它的缺点已经广为人知，但它在原有发展模式下的确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既是对原有发展模式的理念的最好定位和宣传，又是促进各地开展改

* 宗舒，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

革竞赛的一种有效手段。

因此新的问题是，可以用来取代 GDP 的评价体系究竟是什么？目前这仍然是一个有待给出明确回答的问题。国家与地方的治理体系，都需要发展出新的可替代的评估体系，来指导各地发展，促进各地之间的竞争。对于确立新的发展观念、实现国家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言，能否有一套与之相应的评价体系来评估究竟做得好还是坏，无疑是一个重要问题。

为新的发展模式寻找新的评价体系，其实不仅是中国面临的课题，也是全球各国普遍面临的课题。从目前全球已有的探索来看，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体系和 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指数）体系最受关注。

一 GDP 指标的战烙印

美国第一个国内生产总值是 1933 年由西蒙·库兹涅兹计算出来的，英国第一个国内生产总值是 1944 年由米德和斯通两人计算出来的。库兹涅兹、米德和斯通三位经济学家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国内生产总值概念的提出和计算，是 20 世纪经济学的重大成果，它在理论上和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学有密切的联系。

但值得注意的是，美、英两国正规计算和定期发布国内生产总值的最初动力，都直接来自战争动员的需要。在 1940 年法国被德国占领后，凯恩斯正式向英国战时内阁提出建立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主张，以便能准确估计英国的战争生产能力。他建议米德负责这一工作。美国总统罗斯福 1942 年 1 月建立了“战争生产局”，而为该局工作的西蒙·库兹涅兹把 1933 年计算美国第一个国内生产总值的工作进一步发展，直接为罗斯福提供美国战争生产能力的估计。在接到库兹涅兹估算 1942 年美国通过“民转军”能生产 5 万架飞机的第二天，罗斯福即向国会宣布他的目标是 1942 年生产 6 万架飞机。^①

① 崔之元：《中国 GNH 可以“人类发展指标”为主干》，《21 世纪经济报道》2010 年 8 月 5 日。

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带有战争动员的烙印，它的着重点在于通过总产值的增量，估算经济体的生产潜力。这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但是，它不直接涉及国民收入的分配，也不直接涉及和人民幸福感密切相关的健康、教育等指标。随着一国的经济增长超过温饱，向小康甚至丰裕的水平前进，把 GDP 的增长作为唯一评价指标的不足日益显现。

国际学术界近十年来的大量研究表明，人均 GDP 增长和幸福感增长的相关性是一个对数曲线，即在人均 GDP 较低的阶段，GDP 增长能带来较大的幸福感的增长，但在人均 GDP 达到一定水平后（3000 ~ 5000 美元），GDP 的进一步增长，并不能带来同样比例的幸福感的增长，甚至会带来幸福感的下降，即所谓对数曲线变成抛物线。

二 客观化的“人类发展指标”

目前已经较多使用的、取代单一 GDP 指标的评价体系，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 1990 年发表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 HDI），包括人均 GDP、预期寿命和教育指标三大项。它并不完全排斥 GDP，但加入了两个与生活品质有关的指标——健康和教育。

这三项指标的测量方法分别是：健康长寿的生活，用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来衡量；知识的获取，用成人识字率（2/3 权重）和初等、中等和高等学校的综合毛入学率（1/3 权重）共同衡量；体面的生活水平，用人均 GDP（购买力平价美元）来衡量。UNDP 根据得出的人类发展指数，将所有的国家分为三组：高人类发展水平（0.80 ~ 1）、中人类发展水平（0.51 ~ 0.79）和低人类发展水平（0.0 ~ 0.50）。

UNDP 已连续多次发布《中国国家人类发展报告》，包括 1997 年报告（分别根据 1982、1990、1995 年数据）、1999 年报告（根据 1997 年数据）、2002 年报告（根据 1999 年数据）、2005 年报告（根据 2003 年数据）、2007/2008 年报告（根据 2005 年数据）、2009/2010 年报告（根据 2008 年数据）、2013 年报告（根据 2010 年数据）等。

HDI 指标体系的主要优点是数据比较客观, 所需数据也比较容易获得; 整个指标构成既克服了单一 GDP 指标的主要弊病, 又扼要地呈现了人类全面发展的主要方面, 容易理解和运用, 因而容易执行和推广。

三 主观要素占较大比重的国民幸福指数体系

国民幸福指数, 首先由南亚的不丹王国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不丹基于本国文化历史传统建立了一套 GNH 指标体系, 并已有近 30 年的实践。他们提出了自己的发展价值观, 认为只有经济增长的生活方式并不值得追求, 于是将人民的心理幸福、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等因素纳入政府施政的核心目标。

不丹的这一努力影响了法、英、美、加拿大、韩等国家。2008 年 2 月, 法国总统萨科齐成立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国际委员会, 由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牵头, 试图提出一套衡量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的新标准。萨科齐主张以“国民幸福总值”(GNH) 取代“国内生产总值”(GDP)。

美国总统奥巴马 2010 年签署的医疗改革法案第 562 页有一个条款, 要求国会资助并监督一个新的国家重点指标体系 (the key national indicators system) 的创制。这一任务目前由美国国家科学院牵头, 一个名为“美国现状”(State of the USA) 的系统具体承担。“美国现状计划”最终记录大约 300 项指标, 涵盖犯罪、能源、基础设施、住房、医疗、教育、环境和经济等领域。

而除了不丹等少数国家之外, 法、英、美等国家都还没有给出 GNH 体系的清晰指标规划, 因此这一体系也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真正实施。这其实正是 GNH 体系的麻烦所在, 即尽管 GNH 的立意和构想非常好, 但无论对于不丹, 还是对于其他跟进者来说, GNH 体系的指标都过于繁复, 而且相当部分指标的测量要依赖于对国民主观感受的调查。

以目前不丹的 GNH 体系为例, 据不丹研究院院长卡玛·尤拉介绍, 他们在国民幸福指数调查中采用了 72 个变量, 也就是 72 个问题。“我们为每个变量设置了底线, 比如, 如果你体会到平静的频率是‘经